

# 南诏与吐蕃联盟关系的破裂 及与唐关系的恢复 ——《异牟寻誓文》的研究

赵 心 愚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唐樊绰《云南志》收录的《异牟寻誓文》,是反映南诏与吐蕃联盟关系破裂和与唐关系恢复历史进程的重要文献,是南诏人留下的弥足珍贵的原始史料。分析其内容,可以看到南诏背蕃归唐具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关键词** 《异牟寻誓文》;南诏;吐蕃;唐王朝;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11)06—0143—05

唐贞元十年(794年)春,南诏与唐派去的使者盟誓于洱海边的点苍山,双方恢复关系由此得到正式确定。这一对南诏、吐蕃、唐王朝三方关系带来巨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在史籍中只有十分简略的记载,幸有唐樊绰《云南志》收录的《异牟寻誓文》(以下简称《誓文》),使我们可从中了解盟誓双方的具体情况,以及南诏当时对吐蕃的态度和与吐蕃决裂的决心<sup>①</sup>。

向达先生在一篇论文中曾对盟誓时南诏的宗教信仰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异牟寻誓文》开始就提出‘上请天地水三官’,文末‘一本藏于神室’,就是《典略》的‘其一上之天,著山上’,‘一本投西洱河’,就是《典略》的‘其一投之水’,‘一本牟寻留诏城府库,贻诫子孙’,就是《典略》的‘其一埋之地’。《誓文》很明显的用三官手书方式,故南诏的宗教信仰确然为五斗米道,是毫无可疑的。”<sup>[1]</sup>向达先生正是

以《异牟寻誓文》中的材料为据,指出道教在唐贞元年间对南诏显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向达先生的这一看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誓文》的史料价值也引起相关研究者的重视。从《誓文》的内容来看,除所记的一些具体情况可补史籍记载之不足或纠史籍记载之谬外,其主要价值在于具体反映了南诏与吐蕃联盟关系破裂和与唐关系恢复的历史进程,是记录这一历史转折的重要文献。分析研究这一重要文献,可使我们正确地认识南诏与吐蕃及南诏与唐关系出现的重大转折。

异牟寻是位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南诏诏主,史籍称其“颇知书,有才智,善抚其众。”<sup>[2]</sup>《誓文》是否是这位“颇知

①《旧唐书·南诏传》、《新唐书·南诏传》、《资治通鉴》卷二三四贞元十年正月条。樊绰《云南志》卷三《六诏》蒙舍诏条亦对盟誓作了记载,但同样过简。《异牟寻誓文》附于《云南志》卷末,从樊绰所作说明看,是书成后补进的。

收稿日期 2011-07-08

作者简介 赵心愚(1953~),男,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书”的诏主亲自撰写的呢？从目前已有的材料来看，此问题难考，但不论是否是其亲自撰写，这一 800 多字的《誓文》也应出自南诏人之手，是南诏人留下的“弥足珍贵之原始史料”<sup>[3](P291)]</sup>。

从其内容来看，《誓文》可分为 4 个部分，下面逐一进行分析。“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时谨诣站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sup>①</sup>。这一段文字为《誓文》的第一部分，其内容是记此次盟誓的时间、地点及双方参加人员和盟誓时所请神灵。作为载书，这一部分是应有的，并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新旧《唐书·南诏传》等史籍中提到的寻梦湊在《誓文》中并没有被提及，可能并不是正式代表。与《全唐文》所收《誓文》比较，“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一语原本相同，“日”本作“月”。《云南志》校者后将“月”改为“日”，又加“朔越”二字。也有学者主张“越”字毋庸增<sup>[4](P329)]</sup>。在“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一语中，《全唐文》所收《誓文》在“管”字后多一“内”字。尽管《全唐文》所收《誓文》也应采自《云南志》，但今本《云南志》辑录时写官之误多，《全唐文》所收《誓文》有些字句也可能保留了原样。此处加一“内”字，其意更明确<sup>②</sup>。唐使崔佐时职务原文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误，根据《誓文》其后记载，校对者已加“巡官”二字。多数学者赞同，但赵吕甫先生认为应作“判官”<sup>[4](P329)]</sup>。从《全唐文》所收《誓文》看，应为“巡官”。

天宝战争之后，南诏公开与吐蕃结盟，在西南地区与唐为敌达几十年之久。后因与吐蕃矛盾加深，贞元年间渐与唐暗中往来，谋改变政治态度，背蕃归唐。对于这段历史，《誓文》不能不提，其有关的内容就是这一《誓文》的第二部分。这部分内容为：“念异牟寻乃祖乃父忠赤附汉。去天宝九载，被姚州都督张乾陀等离间部落，因此与汉阻绝，经今四十三年。与吐蕃洽和，为兄弟之国。吐蕃赞普册牟寻为日东王，亦无二心，亦无二志。去贞元四年，奉剑南节度使韦皋仆射书，具陈汉皇帝圣明怀柔好生之德。七年，又蒙遣使段忠义等招谕，兼送皇帝敕书，遂与清平官、大军将、大首领等密图大计，诚矢天地，发于祚祥，所管部落，誓心如一。去年四月十三日，差赵莫罗眉、杨大和眉等赍仆射来书，三路献表，愿归清化，誓为汉臣，启告祖宗明神，鉴照忠款。今再蒙皇帝蒙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仆射，遣巡官崔佐

时传语，牟寻等契诚，誓无迁变。”这部分内容极有史料价值，其意实为两层：一是简要叙述背唐投蕃之经过、原因；二是讲与唐暗中接触和决心归唐的经过。比较一下即可看出，前一问题虽不能不提，但只是三言两语，显然不是重点，后一大段文字才是着重叙述的内容。《誓文》内容如此安排，反映出异牟寻当时的一片苦心，即既要讲清问题，又要与唐拉近距离，并为之后的内容打下基础。第二部分的第一字《全唐文》所收《誓文》作“右”，与《云南志》所载《誓文》不同。此处究竟是“念”还是“右”，校注者均未指出。从《云南志》卷十所载《赵昌奏稿》的行文来看，当为“右”。从这一段文字所反映的内容来看，作“右”也显得较为合理。《誓文》这一部分内容一开始即强调“异牟寻乃祖乃父忠赤附汉”，因此，之后所言“亦无二心，亦无二志”应指异牟寻在吐蕃赞普“册”为“日东王”后，仍与其祖其父一样对唐持相同的政治态度。异牟寻之祖父即阁罗凤，其在位时，背唐投蕃，被吐蕃封为“赞普钟”。异牟寻即位后，也与吐蕃合兵攻西川。《誓文》如此讲，虽然与历史事实不合，但为了与唐盟誓，只能如此表达。唐使崔佐时也称《誓文》所言不合事实，但同样为了盟誓，不可能不同意。在谈及与唐暗中往来时，值得注意的是《誓文》没有具体提贞元八年韦皋遣异牟寻书事。这应不是遗漏，而是有意为之，因为韦皋当时的表态，消除了异牟寻疑虑，但此事《誓文》中又不便言，只能如此处理。

《誓文》的第三部分是双方盟誓内容，这部分内容极为重要，既表达了愿望，又提出了要求。其内容为：“谨请西洱河站苍山神祠监盟：牟寻与清平官洪驃利时，大军将段盛等，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山河两利，即愿牟寻、清平官、大军将等，福祚无疆，子孙昌盛不绝，管诸贼首领，永无离二，兴兵动众，讨伐吐蕃，无不克捷。如会盟之后，发起二心，及与吐蕃私相会合，或辄窥侵汉界内田地，即愿天地神祇共降灾罚，宗祠殄灭，部落不安，灾疾臻凑，人户流散，稼穡产畜，悉皆减耗。如蒙汉与通和之后，有起异心，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难，不赐救恤，亦请准此誓文，神祇共罚。如蒙大汉和通之后，更无异意，即愿大汉国祚长久，福盛子孙，天下清平，永保无疆之祚。汉使崔佐时至益州，不为牟寻陈说，及节度使不为奏闻牟寻赤心归国之意，亦愿神祇降之灾。”在这部分内容中，南诏首先面对神祇郑重作出政治表态，即“全部落归附汉朝”，

①本文中的《异牟寻誓文》引文均引自向达《蛮书校注》卷十，中华书局 1962 年版。标点作了适当改动。

②本文所引《全唐文》所收《异牟寻誓文》，载于《全唐文》卷九九九。

也就是背蕃归唐,然后南诏、唐及剑南西川,包括使者崔佐时,通过盟誓作出承诺,接受约束。在上一段内容中,《誓文》已谈及贞元七年段忠义赴南诏招谕兼送唐德宗敕书后,异牟寻与清平官、大军将、大首领一起密图归唐,并谈到贞元九年四月遣使“三路献表……誓为汉臣”事,此处的政治表态,是通过盟誓形式正式作出的,以示南诏背蕃归唐的决心已定,不可更改。前已言及,南诏与唐之所以在敌对几十年后又走到了一起,是因为都面临吐蕃的压力,南诏一方十分清楚地看到,唐之所以不咎既往并与之恢复关系就是为了打击强敌吐蕃,与吐蕃决裂是唐对南诏最主要的要求。因此,南诏在承诺中首先明确表态,“如会盟之后发起二心,及(即)与吐蕃私相会合……即愿天地神祇共降灾罚”。相比之下“或辄窥侵汉界内田地”被放在之后,这显然是精心考虑之后,有针对性的安排。南诏对唐的担心,主要在恢复关系后,唐“窥图牟寻所管疆土”,“及有患难,不赐救恤”,因此在盟誓中,明确提出来,要求唐作出承诺。所谓“窥图牟寻所管疆土”,指唐借恢复关系控制南诏,使南诏丧失自己的地位与权利。所谓“患难”、“救恤”,包括了吐蕃可能的武装进攻及唐出兵相援。对剑南西川节度使及崔佐时,南诏的要求是为之陈说并上奏,也将其写入《誓文》并要求对方作出承诺。总的来看,在这段文字中,南诏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决心做到的和不会做的,也明确提出了要求唐及西川节度使、崔佐时做到的和不希望见到的。由于盟誓双方参加,唐及西川节度使、崔佐时亦同受誓文的约束。此段开头的“谨请西洱河玷苍山神祠监盟”一语中之“监盟”《全唐文》所收《誓文》作“严盟”,校注者均未指出是否存在误字,从《誓文》最后内容及表达用语来看,“监”、“严”可能均误,本当为“鉴”,祈请神灵为证,即“鉴盟”。同样,从《誓文》前后用语来看,“管诸贼首领”一语前可能掉一“所”字或“内”字,即当为“所管诸贼首领”或“管内诸贼首领”,这样其意就十分清楚了。在“汉使崔佐时至益州”一句前,可能有一“如”字,即当为“如汉使崔佐时至益州,不为牟寻陈说”,这与之前“如会盟之后”、“如蒙汉与通和之后”、“如蒙大汉和通之后”用法一致,均言假设的情况。

《誓文》第四部分文字不太多,有些文字还是载书最后的套话,但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内容为:“今牟寻率众官,具牢醴,到西洱河,奏请山川土地灵祇。请汉使计会,发动兵马,同心戮力,共行讨伐。然吐蕃神川、昆明、会同已来,不假天兵,牟寻尽收复,铁桥为界,归汉旧疆宇。谨

率群官虔诚盟誓,共克金契,永为誓信。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使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伏惟山川神祇,同鉴诚恳。”在这部分内容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南诏请唐盟誓之后尽快考虑出兵打击吐蕃,以实现双方“同心戮力,共行讨伐”。二是强调在共同进攻吐蕃控制地区时,“神川、昆明、会同以来,不假天兵”。三是明确“铁桥为界,归汉旧疆宇”。从以上三点来看,南诏当时当已在谋划出兵袭击铁桥,所以盟誓中能如此明确言“铁桥为界,归汉旧疆宇”。所谓“归汉旧疆宇”,并不是指铁桥以南地区夺回后交由唐控制,而是归唐后的南诏控制这一地区的委婉说法,这与《旧唐书·南诏传》所记阁罗凤遣使言:“若不许……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也就是云南本为唐所有一致,即南诏背蕃归唐后,南诏控制之地名义上也即唐疆宇。同时,从以上内容也可知唐在盟誓时还没有具体的在西南地区联合南诏打击吐蕃的计划,至少此时还没有向南诏通报这方面的计划。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假天兵”,这是异牟寻再次强调的原则。在贞元九年异牟寻致韦皋帛书中,便首次明确强调“此西南隅不烦天兵,可以立功云”<sup>①</sup>。此处再提,从“不烦天兵”到“不假之兵”,涉及的地区,异牟寻说得更明白,并明言由南诏“尽收复”,也就是由南诏控制,这与前一段内容中南诏不希望见到唐“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也一致。这是异牟寻不能不说的条件,唐王朝方面应已明确这一点,也不可能反对,所以写入《誓文》之中。在《全唐文》所收《誓文》中,“到西洱河”作“对西洱河”。“到”与“对”,字形相似,究竟是“到”还是“对”,校注者均没有指出。从《誓文》开始所言“谨诣点苍山北”和《誓文》中所言“谨请西洱河点苍山神祠”来看,如作“到”,似乎盟誓双方在盟誓过程中又换了一个地点,这应是不可能的。南诏与唐使者在点苍山举行的是盟誓仪礼,所谓“盟”,是在神前立誓缔约,请神灵为证,这就是在神祠里举行这一仪式的原因,不必再到西洱河去。根据《云南志》卷二中关于玷苍山的记载,分析《誓文》前后内容,作“对”可能较合理,但前又当脱一“遥”字,即原为“遥对西洱河”。《誓文》中,有“共克金契,永为誓信”语。此次盟誓之后,刻有金契,在史籍中也有明确记载<sup>[5]</sup>(卷二三四贞元十年正月条)。<sup>[6]</sup><sup>[2]</sup>。王忠先生提出,此“金契当即进献于唐朝之誓文”<sup>[7]</sup>(P60)。这一看法当然有其理由,但分析史籍相关记载,金契内容即使与《誓文》有关,也不会是全文,“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的那本《誓文》当与其他三本一样,应为全文复制本。

①《异牟寻帛书》,载于《新唐书·南诏传》。



“会同以来”的“来”字,古今校者注家均未提出异议,但从记载来看,会同与神川、昆明不同,本在南诏控制下。疑本为“西”,误为“东”,再因字形相似,又误作“来”。

从以上对《誓文》4个部分的分析来看,800多字的《誓文》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涉及诸多方面。如果概括一下,《誓文》的主要内容、主要精神或主要想表达什么呢?有学者认为,其“主旨是唐、南诏抛弃前嫌,重归于好,并将吐蕃势力逐出云南,南诏永为大唐西南藩屏”<sup>[8](P22)</sup>。有的学者则指出“主要宗旨是把吐蕃势力逐出云南,南诏重新归附唐朝”<sup>[9](P58)</sup>。还有的学者指出了《誓文》的主要规定是:“盟辞规定南诏臣属于唐,并不得怀有二心,但唐得承认其所管辖的地域,并赋予南诏充分的自治权。……盟约还规定共同讨伐吐蕃。”<sup>[10](P322)</sup>强调这些规定,实际上也就是认为这些是主要内容。从《誓文》4个部分的内容来看,以上看法基本是正确的,但或不够全面,或没有明确指出其实质。王忠先生指出:“誓文之主要精神在于驱逐吐蕃势力出云南及拒绝唐势力入云南,以保持其独立地位”<sup>[7](P60)</sup>。笔者基本赞同王忠先生的这一看法,但同时认为,应明确南诏背蕃归唐和双方共同对付吐蕃也是主要精神之一。

## 二

分析苍山盟誓的经过及《异牟寻誓文》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在南诏、吐蕃、唐王朝三方关系互动的大背景下,南诏背蕃归唐具有这样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南诏的背蕃归唐是有条件的,换言之,也就是南诏与唐重归于好恢复关系不是无条件的。从史籍相关记载和《誓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南诏向唐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几个条件:一是归唐之后,唐不得“起异心,窥图异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这一条非常重要,应是南诏提出的前提条件,故异牟寻要在盟誓中明确提出,其实质是要求唐承认并保证不损害南诏已有的利益。二是提出“及有患难”,要给予“救恤”。这一条南诏并非随意提出,而是有其用意的。所谓“患难”、“救恤”,前已提到,不仅仅是指经济、民生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南诏归唐之后如果吐蕃武力相逼,唐必须出兵相援<sup>①</sup>。三是明确提出,“吐蕃神川、昆明、会同以来,不假天兵,牟寻尽收复”。这一条的实质与第一条相同,不同的是前者是强调南诏已有的

利益在归唐之后,唐朝不得损害,后者则将这些尚在吐蕃控制下的地区已视为南诏的势力范围,要求唐也不得染指。“牟寻尽收复”,即宣称由南诏控制。四是要求复号南诏。这一条与前几条不同,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所封王号问题,实际上是南诏精心考虑的条件之一。《旧唐书·南诏传》载:“异牟寻乃去吐蕃所立帝号,私于佐时请复南诏旧名”。《通鉴考异》载:“韦皋奏状皆称‘云南王’,而窦滂《云南别录》曰:‘……册异牟寻为南诏’,盖从其请。”盟誓的当年,唐从其请,即同意这一条件,册封异牟寻为“南诏”。为何异牟寻在《誓文》中还自称“云南诏”,却又向崔佐时提出“复南诏旧名”呢?云南诏即云南王。方国瑜先生曾指出,因南诏并六诏,统一洱海地区,也就是汉之云南郡地,所以有此王号,“‘云南王’即‘云南郡王’”<sup>[11]</sup>。“南诏”与“云南王”含义不同,不再是一个郡王,而有“南王”之意<sup>[12]</sup>。王忠先生分析相关材料后这样认为:“复号者,从其俗,亦示其独立地位也。”<sup>[7](P62)</sup>王忠先生此言,指出了异牟寻提出这一要求的真正意图。南诏既然盟誓归唐,决心与唐恢复关系,为何又提出这样一些要求甚高的条件?实际上,这与南诏为何要背蕃、重新以吐蕃为敌的原因一样,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当利益受到损害、生存受到威胁时,南诏就下定决心与吐蕃决裂,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毫不含糊、犹豫。南诏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才与唐重归于好,因而在与唐商谈恢复关系时,南诏必然要提出维护自身利益的条件,不可能是无条件的。以上几个条件,主要原则就是维持归唐后的基本独立状态,不给唐以任何机会。南诏之所以敢于提出这些条件,唐之所以只能接受这些条件,与南诏、吐蕃、唐三方关系的互动背景有关,简言之,正是因为吐蕃威胁的存在,这些条件才能被提出和接受。

第二,背蕃归唐之后,南诏与唐的关系并不是天宝战争之前的那种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臣属关系。有学者在谈到南诏与唐恢复关系重新归唐时说:“南诏重新归唐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唐朝方面讲,不仅恢复了原来的边州政策,并把中原与边地、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央与地方之间和睦相处的历史进程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sup>[13](P138)</sup>。在这位学者看来,苍山盟誓和册封异牟寻为南诏后,南诏与唐的关系就恢复到天宝战争以前的状态,唐的边州政策亦得到恢复。从之前对盟誓经过及《誓文》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事实并非如此。前已言及,南诏背蕃归唐是有条件的,这些条

<sup>①</sup>有学者将《誓文》中的“救恤”解释为经济、文化的帮助。笔者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救恤”当以军事上的支持为主。见陈子丹《苍洱之盟与〈异牟寻誓文〉》,载赵怀仁主编《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件已决定了双方恢复的关系与天宝战争前已有相当大的区别,是一种特殊的臣属关系。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曾这样评论南诏与唐恢复的关系:“与唐重建正式的联盟只需要一些象征性的卑躬顺从,并未减少南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自治。”<sup>[14](P118)]</sup>查尔斯·巴克斯这一看法并不全面,因为南诏与唐之所以能又走到了一起,不仅需要象征性的卑躬顺从,更需要南诏与吐蕃决裂并出兵与唐共同打击吐蕃,但其看法仍很重要,即指出了这一重建的关系具有的特殊性。所谓“象征性的卑躬顺从”,当指的是如《誓文》中所言的“誓为汉臣”、“归附汉朝”之类的一再表态,并朝于唐、献方物、求赐命、奉唐正朔以及纳质等,这好像与天宝战争前也相似或相同,但从前已谈到四个条件来看,归唐后的南诏已不是天宝战争前的那个南诏了。分析《誓文》及之后史籍的记载,背蕃归唐后的南诏,在处理与唐关系时,只是名义上的臣属,实际上是内部事务不容唐插手,也就是查尔斯·巴克斯所说的“自治”。有学者对这种状态下的南诏与唐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合唐册封异牟寻为“南诏”这一史实,认为归唐后的南诏已不是天宝战争前的那种在唐统治下的地方势力,而是统治范围得到唐承认的藩属政权<sup>[15]</sup>。这种看法确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将背蕃归唐后的南诏与唐的关系称之为特殊的臣属关系可能更恰当。这种名义上臣属、实际上又统治不了的特殊关系,唐之所以认可,南诏之所以敢于坚持,其原因也与前论及的一样,是因为吐蕃威胁的存在。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南诏、吐蕃、唐三方关系的变化,决定了南诏与唐关系的发展。

第三,背蕃归唐之后,南诏与唐关系虽然得到恢复,但明显存在着不稳定性。从史籍记载来看,尽管苍山盟誓及册封南诏之后,南诏与唐关系密切,往来不断,并合兵打击吐蕃,但由于前面所说的两个特点的存在,决定了归唐之后,南诏与唐的关系明显存在着不稳定性。从以上两个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到,南诏与唐之所以能够重归于好,南诏之所以敢于提出4个条件,敢于坚持特殊性质的臣属关系,唐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些条件和认可这种关系,都是因为吐蕃威胁的存在。根据史籍记载,8世纪末的吐蕃仍有强大的实力,有力量对唐和南诏展开进攻,双方只能联合起来,协调行动,才能抵御吐蕃或进攻吐蕃在西南的控制区域。有学者在分析南诏崛起的原因时说:“吐蕃的南下促成了南诏的崛起。”<sup>[16]</sup>这一看法是有充分依据的,从史籍记

载来看,的确如此。与之相同,由于吐蕃威胁的存在,促使南诏与唐又走到了一起,因为重归于好才能共同对付吐蕃的威胁。可以说,吐蕃的威胁成为双方恢复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联合打击吐蕃则成为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此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原因与基础并不是不变的。当原因与基础出现变化之后,南诏与唐双方的关系就必然出现变化,不可能是长期稳定和不变的。方国瑜先生在分析南诏、吐蕃、唐三方关系时曾说:“吐蕃衰落以后,南诏与唐朝间的关系密切,而争夺也多了。”又说,吐蕃的威胁“逐渐衰退,唐(南)诏冲突由微而显,到咸通元年(860年),世隆继南诏位,唐(南)诏战争历年不息”<sup>[12]</sup>。方国瑜先生所言,正是指出南诏与唐关系存在不稳定性,由于原因与基础出现了变化,南诏与唐的关系便随之而变化。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南诏与吐蕃和南诏与唐的关系,均与三方关系互动有关。

#### 参考文献:

- [1]向达.南诏史略论——南诏史上若干问题的试探[J].历史研究,1954(7).
- [2]旧唐书·南诏传[O].
- [3]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M].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
- [4]赵吕甫.云南志校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5]资治通鉴[O].
- [6]新唐书·南诏传[O].
- [7]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证[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8]李公.南诏史稿[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 [9]李昆声,祁庆富.南诏史话[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 [10]卢勋,等.隋唐民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 [11]方国瑜.唐封皮罗阁为云南郡王[A].方国瑜文集(第一辑)[C].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
- [12]方国瑜.南诏与唐朝吐蕃的和战[A].方国瑜文集(第一辑)[C].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
- [13]詹全友.南诏大理国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 [14][美]查尔斯·巴克斯.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M].林超民,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 [15]方铁.论南诏与唐朝关系的性质[A].方铁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2辑)[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
- [16]郭大烈.唐代吐蕃的南下与南诏的崛起[A].杨仲录,等编.南诏文化论[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杨 宪]